

海天出版社



萧乾卷

中卷

未带地图

行旅人生

傅光明 著

谭艺书系·萧乾卷中

傅光明 著

海天出版社

未「带」地图

行「旅」人「生」

我认为应该尽可能用直接的描写， 就是速写、白描，一笔笔地刻画

1939年10月，萧乾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抵达伦敦。在开战后疏散到剑桥的东方学院任教的同时，一面为中国的抗战进行国际宣传，一面向《大公报》发回大量特写。

《记坐船犯罪》记述一个法国殖民主义港口警察把过往旅客视为囚犯。那些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蛮横无理，狂傲自大，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年代作为一名中国人要遭受怎样的厄运。萧乾在此流露出一种激奋和愤怒，内心充满了亢奋的民族自尊。由于写了殖民者的粗暴无礼，此文从苏伊士寄回香港刊出时，已被砍得面目全非。

《赴欧途中》勾勒出几个他在坐船赴欧途中遇到的人物，他们性格各异，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抗击法西斯。一个把爱情散布世界各角的海军下士，为法兰西放弃了发誓爱过的白俄情人；七十多岁的唐纳夫人面对残酷的战争并不畏惧，希望能像上次大战一样，为自己的祖国出力；一位年轻的神父，为了法兰西，毅然剃髯弃袍，奔赴战场；上海滩流浪汉与白俄舞女的私生子，高兴战争也许能给他带来国籍。他尝够了别人的白眼，渴望得到一张正式的护照，一个确定的国籍。萧乾由此感慨：没有国家，便没有了存在，这才是真理，得守着它！然而，在我们这片幸运的土地上，竟有把这份存在双手奉送给主子的呢！

萧乾在《欧洲往哪里去？》中，以敏锐的国际事物洞察力，分析了当时欧洲的现状。他没有直接批评英、法的绥靖政策，也没有预卜欧洲将走向何方，只在结尾处表明了自己的期望：如果英国在远东背弃了中国的正义和友谊，与日本密谋妥协，则除了道德和威望

的丧失外，还有更大的亏吃。到了晚年，他回忆自己当时希望英国先帮中国打败日本，然后再去对付德国，真是一相情愿到对国际事物没有起码的常识。不管怎样，他密切注意着战争进展的动向，随时把自己的观察、见闻、感受、分析，通过特写，传达给国内的读者。

《剑桥书简》只有两篇，是优美而伤感的随笔特写。第一篇提到两件值得注意的小事。一是发生在驶往马赛的法国家船上，法国理发师给萧乾理发时，跑开去陪一位妇人聊天。二是发生在巴黎车站。萧乾结识的一位黑人姑娘，向他讲述在她的祖国巴哈马，白人如何歧视黑人。这两件小事提醒人们，一个国家没有地位，她的人民也会受到歧视和奴役。第二篇描绘战时剑桥的景况，一切还显得那么闲适，不像发生了战争。

从萧乾这一时期的特写，我们可以找寻他在英国生活、学习和思想的轨迹。《伦敦日记》记录了他初到伦敦的行踪，走访狄更斯故居；拜扫哈代墓；在阿克顿陪同下，拜访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魏理。这位翻译过《诗经》、《四书》、《道德经》和《红楼梦》的汉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他要在脑中保留唐代中国的形象。《战时英国印象》从许多方面写战时英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战争没有足够的准备和认识，时常忘记正在实行的“灯火管制”，忘记希特勒迫在眉睫的威胁。《战争与宗教》则是用富有趣味的事实，展示战争阴云下宗教徒们的真正信念和灵魂。《妇女在战争中》描写英国妇女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和作用。《滇缅路开放之前》描述英国为保全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与日本签订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之后，英国朝野的一些动态。《活宝们在受难》是篇饶有情趣和深意的妙文，它借猫狗等家畜在战争中的遭际以及围绕它发生的种种事情——它的副题是《空袭下的英国家畜》——反映英国战时的社会风貌和世态民情。

萧乾这一时期的特写内容丰富，以独特的视角多侧面地展现

英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最有特色的要属“话说当今英格兰”系列特写中的三篇：《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和《银风筝下的伦敦》。我想把它们称为“伦敦特写三部曲”。加上后来写的《南德的暮秋》，这几篇堪称特写中的经典佳构。它们以犀利的眼光，明快的笔调，论事说理，白描人物，在看去轻松的娓娓清谈中，把主题表现得那么精当深刻，丝丝入扣。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和谐清新的幽默。这自然得益于他熟稔英国随笔之神髓。

不过还是有学者苛刻地指出，他的特写毕竟有新闻性的需要，所以带上一种叫你过瘾的赶场般的“流动”感，有如你陪他坐在风驰电掣的吉普车里，左顾右盼，难有机会流连小驻。为着向国内读者报告英国及后来西欧战场的最新消息，他总是马不停蹄地构思、赶写完一篇稿子，又朴朴风尘地上路了，难免在身体劳瘁当中写得仓促，像《欧战爆发后英国援华现状》、《英国思想界之轩波》、《剑桥春季大辩论：英国应否积极援华》，《暴风雨前的英国》、《德军猛进声中英国国内的动态》、《伦敦一周间》、《老伙计日已》、《伦敦城大过圣诞节》、《进攻的故事》、《1940年欧洲稗史大观》、《民治国家特色之一》、《衣食足然后可御侮，战时物质供给问题》、《疏散与失学》等，都多少带上了这样的弱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二战期间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

**妄图称霸天下的歹徒野心家，总以
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
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

《血红的九月》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940年9月伦敦遭德国空

军大轰炸以后的情景，以及由于英国政府不重视防空战备和人民普遍存在轻敌思想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萧乾从轰炸后伦敦惨景写起，以大轰炸前的情况为对照，警告人们对战争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防备。可在“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纳粹轰炸机会对这么古这么美的大城市下毒手。所以，“战虽宣了一年挂零，对伦敦八百万市民，这半个月还不能不说是场突来的噩梦”。

“噩梦”惊醒了伦敦市民，可政府还认为挖深壕没有必要。事实上，正是由于政府缺乏警戒和战备，才造成此刻的惨状：昔日繁荣的牛津街被炸得稀烂，幽静森凉的大伦敦如一“中古僧院”，安全感的幻灭，遍及全伦敦。萧乾通过轰炸前伦敦充满“安全感”和轰炸后这种安全感消失的对比交迭描写，提醒人民现在是战争状态，不能再麻痹酣睡，要加强战备。《血红的九月》分六节从几个方面报道反映德国的轰炸给伦敦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深刻表现了伦敦人民在轰炸噩梦中吸取的“血红”教训。

萧乾是位高超的艺术剪裁师，他巧妙地把六组分镜头组接在一起，画面更迭错落，场景变换有致，似在放映一部新闻纪实片，在战争气氛的渲染和战时现实问题的关系中，启示人们从死亡的恐怖中振作起来，投入战斗。

“十三个月来，我观察着善与恶，忧与喜的交流，少年的激奋，中年的镇定，一个民族的灵魂各面，如走马灯般晃着，如怒潮般澎湃着。”《矛盾交响曲》就是对战时英国民族灵魂各面的素描。萧乾想认真画好这幅“英格兰”画，可不知怎么落笔，因为“这是个矛盾的时代”。他通过描绘一幅幅真实的写生素描，把战时英国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现象表现出来。

首先，“这是个英雄时代”，“一座平民住宅眼看倒下来。十个壮汉用胳膊硬托了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抱扶老少。”一个戏

班子巡行二千多哩为军队作义务表演；一位年近七旬的义勇救护员，为救邻舍失去了右眼；某城防空壕里，还有个四岁的管理员；伯明翰一位不露名姓的古怪善人，沿着几条穷巷按户往信箱里投金镑票；布瑞斯陀一个老樵夫，每周末把工资中剩出的十先令交给红十字会。这是战时英国的主旋律，普通的人，不平凡的壮举，体现了英国人民崇高的责任感，急公好义的精神和壮烈的英雄气概。

写好一个人物，在于刻画他的灵魂。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她的民族精神。“英国人是个好幽默的民族。在危机中，他们喜欢用幽默来表现镇静、沉着”。萧乾截取了几个典型体现英国人这种崇高幽默感的事例，突出表现他们的镇静、沉着、乐观、自信。例如，《泰晤士报》上有读者提议“马奇诺防线应遍种玫瑰，以示杀敌不忘自然美”。屋顶被炸开，屋主说“这可能揭破了个谜，原来冬天苍蝇藏在那儿”。一个空场被炸出个坑，第二天就有人“把碎砖排齐，坑缘上栽几棵绣球花，旁题‘戈林花园’”。萧乾在修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萧乾选集》第二卷中的《矛盾交响曲》时，曾加进一段《人生采访》原版中没有的情景：“就在纳粹对伦敦狂轰猛炸之际，女钢琴家缪拉·海斯等一批英国音乐家在市中心的国家艺术馆举办一种‘午餐音乐会’，入场卷只一个先令。大家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站在那里（没有座位）听三重或四重的室内音乐。”这种战火蔓延中表现出的闲情逸致，不啻是对德机轰炸的莫大轻蔑，是精神上的示威运动。对比国内，在日本人的恣意蹂躏下，中国人太缺乏幽默感。当然，话不能如此说，倘若纳粹真的占领了英国，英国人的幽默也就不会来得这么轻松、随意，而会代之以严酷的浴血奋战。

萧乾并没忘“矛盾”的另一面，战时英国社会的另一番情景，英国人民英雄交响曲中的“低调”。例如，有几百名英国男子为逃

脱军役，征兵法案刚一提出，就到婚姻登记所，一下子速成为“已婚人”，“被炸出的房客正彷徨清冷街头时，房东还拉长了脸催付房租。爱丁堡一个印刷局老板，因为巨厦里收容了三对难童难母，竟起诉说有碍他独居的自由。”这确是矛盾的时代，有英雄、慷慨、仁慈的一面，也有冷酷、暗晦、炎凉的一面。

这篇特写通过对战时英国社会的深刻观察，以一系列具体可感的事实，展示英国最伟大时刻民族灵魂的“各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节奏明快，语言简练，画面感强且富于动感，是这篇特写的主要艺术特色。

《银风筝下的伦敦》则从正面展示英国人民机警、沉着，奋勇抗击德国空军的壮阔场景，表现了英国人民为保卫祖国与纳粹英勇战斗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萧乾先是借助飘满伦敦上空的银风筝这一自然景观，使人猝然感到这是战时的伦敦。是什么力量抵御着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没使伦敦成为华沙。特写一开头即作了有力的回答：“是那埋伏在全在黑暗中吹哨的纠察员，救护救火队员们。自然，主要是截迎的战斗员”。这些英国领空的坚强卫士，保卫着伦敦，保卫者英格兰。接着，萧乾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英雄们感人的英勇行为。专门对付定时炸弹的“敢死队”，成天凭了机智和勇墩同死亡开着玩笑。“当伦敦上空在交手时，伦敦地面上，千万机匠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烦地修整着那些肠肺。”为负责紧急防空警报应运而生的“巡风人”，是又一批英雄，“风打雨淋，他们眼睛不能离开云天。看着弹落，看着火烧，他们担负脚下数百同胞的安全。”另外还有戴钢盔的“纠察员”，他们必须随时准备“挨炸，挨跌，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奶妈，产婆，郎中，抬理的，募捐的”。“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阉牛，机警如枭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伦敦数万救火员中，已有百余名殉职。这些“无名英雄”急

公好义，不怕牺牲，把生的希望留给同胞，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他们是英国的灵魂和脊梁。

同《矛盾交响曲》一样，这篇特写从另一方面通过几个富有特征性的“画面”，表现英国人的自信和幽默。例如，德国飞机撒下的希特勒劝降演词，成了募救国捐的工具。“红十字会把它们集起，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在威尔士某地，行市每张贵到五先令。后来买者太多，幽默的英国人发起了‘一便士一看’”。集资全给军队。大轰炸后，刨掘队从乱砖中发现了一个被埋四昼夜的十四岁女孩，’问她痛吗。“仰卧在重梁下的她，还照平常礼数说：‘谢谢先生，我很好’。没有恐慌、害怕，表现出惊人的沉着、镇定。英国人乐观、幽默的民族性格在一个小女孩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在最漆黑的日子里，伦敦还能笑。破屋，送奶车，起重机上全悬着饱经风霜的国旗，颓壁上写着种种谐句”。萧乾在新版中，直接加入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议论：“这不仅表现了英国人的幽默感，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结局的信念”。以上这一切，构成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的战斗风貌。

《银风筝下的伦敦》是萧乾特写中的精品，结构精巧，语言质朴而富情韵，白描技法运用得纯熟自然，通过一系列素描，甚至简约的速写，形象而鲜明地反映出战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和英国人民的精神情绪。

萧乾这期间反映战时英国风貌的特写，还有另外两篇也称得上佳作：《伦敦三日记》和《1940年的圣诞》。前者是《银风筝下的伦敦》的前奏，后者是它的续曲。《伦敦三日记》的生活气息比较浓，战争气氛淡一些，而且蕴藉了作者深切的民族情感。《1940年的圣诞》依然表现英国人面对战争的从容和镇定。在大轰炸的阴影下，英国人还是过起了古老的圣诞，它对人民的精神是一大补剂。他这样写显然就是要让在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国内同胞，

面对日军的大轰炸，能从伦敦人的镇定中得到鼓舞。他希望中国人能像在大毁灭面前的英国人一样，昂起头，挺直腰杆，闪现一个民族最光彩的精神。一个同仇敌忾的民族是永远战不败的。妄图称霸天下的野心家，总以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大轰炸却恰恰使英国人民抱成一团，攥成了一个拳头。

作家有着天生的正义感

《龙须与蓝图》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包括《关于机器的反思》、《易卜生在中国》、《龙须与蓝图》和《文学与大众》四篇演讲论文，于1944年7月由伦敦引导出版社出版。

《关于机器的反思》谈的是英国长篇小说中关于“机器”的处理，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机器”的看法。《易卜生在中国》主要讲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海上夫人》等，对五四期间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表现出的憎恨、抗争、反叛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正好适应当时中国青年渴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和社会改革的需要，甚至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文学与大众》是篇对印度的广播，浅谈中国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抗战爆发前几年，就有许多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抱怨说，白话文作家‘艺术的散文’和‘象征的诗歌’比文言的作品离大众更远……实际上，一大批普罗文学作品对普通读者来说，同我们颓废的象征主义者的创作一样难懂，所以，三十年代初期，就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呼吁使用‘大众的语言’”。

《龙须与蓝图》是1942年底萧乾在华莱士藏画馆的演讲，这

个题目很有象征性，“龙须”象征中国的传统文化，“蓝图”代表西方的机械文明，即现代化。

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乔治·奥维尔在1944年8月6日的《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奇迹》（Chinese Miracles）的评论文章。他说：“萧乾先生论述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国发生变革，成为一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国家吗？对世界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走一条与日本相同的路，那结果将难以想象，中国已能生产机枪，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产轰炸机……但她的艺术传统植根太深，以致不能为机器所毁灭，同时，中国人又不得不跻身现代世界，而且不喜欢人们说她猪尾巴（辫子）比钢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适当地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她又乐于回到龙须（即回到中国书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闲适的文化）”。

9月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载文评论说：“中国革命的真正重要，在于使青年一代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使他们的思想拓宽并成熟起来。萧乾先生主要谈了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磨难中，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新文艺运动。论及机器暴政的文章具有世界意义，他的写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人，无论长幼，都该读读这奉书。”

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一位中国思想家》极有见地，它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检验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展示古老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苦难斗争’，探讨中国传统与西方技术之间可行的调和方法及途径。萧先生对这些题目的处理，显示出他是那么熟悉英国现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它们直到最近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他说，中国新文学一直缺乏创造精神，完全是乡下人的产物……他对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见解，本质上是那种：龙须’；他提到很多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散文家，而

很少提及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文章在讨论‘可行的调和’方面缺乏创造性思想。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他承认‘龙须’观念最终支配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坚持说孔教哲学已成为过去。他认为家庭不再是社会的个体，已被个人所取代，恰如工业正在逐步取代手工业和农业。这是个广泛的假设，现存条件下，既得不到证实，也不能被驳倒”。

萧乾在文中指出，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进行着一场战争，她不仅反对军事侵略和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且反对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一种要强加于人的思想模式。中国是个农业国，保守得近乎顽固，并以自身的文化体系抵制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她对机器不屑一顾，而且烧毁了在其土地上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她在世界到处都是打字机的时代，仍想保留古老的书法艺术；她想用帆板漂流在一个有航空母舰和鱼雷的世界里”。

在《龙须与蓝图》中，萧乾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比喻，把整个世界比为一间教室，中国这个“新生”是在19世纪上半叶硬被推进来的。她“腴腆、自负、笨拙、土气，留着过时的辫子，手指甲足有四英寸长”。她年龄最大，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但入学比别人晚。其他学生都禁不住嘲弄这位傲慢、别扭、与他们不和谐的学生。而且有个学生企图一口把她吞噬。这个象征性的比喻再明白不过，中国历史悠久，古老文化渊源流长，但清末国力衰微，闭关自守，被外国列强轰开大门后，倍受欺凌，特别是日本的蹂躏。这个学生与机械文明的距离太远了。老师问她学过代数吗？她说没有，但会区分80种不同的兰花。老师又问她能否画排污系统图，她却在纸上画了几缕如在雾中的精美“龙须”。可当她用功学代数，认真踢足球时，别的学生却反过来欣赏起“龙须”了。这些学生里一定有罗素，他和西方一些汉学家一直希望战后的中国回到古老文明的“老古玩店”时代，保留“龙须”。萧乾自然希

望中国这个“新生”成为一名“制图师”，绘制宏传的现代文明“蓝图”。他认为，中国的文学革命和迄今为止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正是“龙须”与“蓝图”相碰撞的直接结果。

我一直感觉，这篇演讲的前三分之一同后三分之二部分在内在逻辑的发展上有些脱节，转折来得比较突兀。前三分之一，以独特的比喻，精辟的论述，表现出萧乾现代化的“蓝图”思想意识，浅显的语言反映深邃的思想。后三分之二转向描述白话文运动以后，各种政治气候和文学环境下中国文学创作的迷茫和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战争为所有作家解决了素材问题，“六年来，中国作家们开拓了生活的视野。他们目睹了苦难、残酷和英雄主义，看到了华北平原、蒙古草原废弃的村落和死亡的战士，看到了中国的再生。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作家，他们就会在记忆、在心里、在头脑中铭刻、感受和浮现这些苦难的经历。战后，他们能不创作出一些忠实可信的作品吗”？

文章最后，萧乾才又回到开头的比喻：“我们的西方朋友不用为那些龙须担心，它们是我们的传统，就在我们的血脉里。但如果西方人让我们把足球扔到黄河中，只会使我们愤怒。更有力地，说，尽管有恐惧和失败，每个人都必须踢足球，否则就会灭亡，当真正的和平到来时，我们都可以回到各自的龙须。”

总之，萧乾认为战后的中国应该走一条“龙须”与“蓝图”相互调和的路，既要保持古老文明的“龙须”，又要进入现代文明的“蓝图”设计。战后的文学应如何呢？萧乾的设想是：因为战争的悲剧使人们认识到，作家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所以每位现代作家都应有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必须尽早达到这一目标，使想像力飞越人为的界限，使理智的诚实取代可怜的忠孝”！

那时世界大事宛如过眼浮云，
我不甘只像个气象报告员，
那样报报温度和风向

1942年到1944年，萧乾钻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艺术的象牙塔，专门研究意识流小说。1944年春，《大公报》老板胡霖随中国访英代表团抵达剑桥。他竭力劝说萧乾放弃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离开剑桥古雅的校园，去当一名职业记者。他来剑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萧乾从象牙塔里拉出来，去驰骋欧洲战场，当一名实录风云的随军记者。他预计盟军在西线反攻的时候不会太久，就对萧乾说：“从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问题是你还迷信什么学位，当个无声无息的学者呢，还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干它一场。”

萧乾陷入了沉思，他从心底反对战争，向往自由，渴望和平，但现实世界充满了矛盾，自由、和平的获得，往往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每当他走过伦敦国家美术馆时，就不禁自问，如果没有纳尔逊特拉法加尔战胜拿破仑海军，会有今天的国家美术馆吗？当一名记者，不是正可以实录风云，揭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创伤吗？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他发现，尽管詹姆斯、吴尔芙、乔依斯都是天才的小说家，但他们对意识流的探险是一条充满迷彩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他天性活泼、好动，打青年时代起，理论总是叫他头痛心闷。他更愿意到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采访人生。他终于接受了胡霖的劝告，于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西线大反攻，伦敦正遭受希特勒V2飞弹轰炸之际，在英国报界集中的舰队街开设了《大公报》驻伦敦办

事处。

萧乾在特写《虎穴的冲击》开篇即描写到：“6月6号，英美两栖大军以立体战术，冲开西欧‘铁墙’的一角，三周之内，以四万伤亡对七万敌人损失，争得一块庞大立脚点，打通‘到柏林去’的一条路，在世界史上今后的重要性，是不需另外夸张的。这是四年来埋头苦干，一年来经营筹谋的结果，是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是全欧被奴役千万民众解放的信号。”萧乾由舰队街向《大公报》发回大量特写，向祖国的读者报道来自英伦的喜悦，但喜悦很快就被希特勒耗尽血本最新研制的V2飞弹的轰炸淹没了。经过1940年大轰炸的萧乾已不像上次那么恐惧，虽然这次轰炸比上次造成的损失、伤亡大得多，他照常经常去舰队街的《大公报》办事处上班，有时甚至爬到高处，眼看那发出刺耳声音的飞弹落下来，完好的房屋顿时化成瓦砾。

1944年8月22到26日，世界笔会伦敦中心在南肯辛顿的一个演讲大厅，举行了为期五天的演讲大会。这次大会是为纪念英国伟大诗人密尔顿诞辰而举办的，演讲的主体是“人类未来的精神位置和经济价值”。会议要求与会的各国作家自由演讲。萧乾的演讲题为《一个梦想家的呼吁》。他以纯熟的英语开头就讲了一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在我们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顶端，站立着三个伙伴：思想家、梦想家和实干家，”他认为，一个制造枪炮的人，也能欣赏艺术，在午餐桌上听一段17世纪的音乐，但他无法把枪炮同巴赫联系起来。甚至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怀疑，精神价值是永恒的。可它又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创伤。因此，他从心底发出呼吁：“多种些玫瑰吧！”“我想我们可以做三件事：（一）用战舰、装甲师为每个文化实体修筑堡垒，这意味着可以回到战前美好而古老的日子——每个堡垒守着自己的大门。（二）第二件最好的事情是建造一个巨大、坚硬的堡垒，保护所有国家的

精神价值，成立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组织，就像此刻正在敦巴顿橡树园（在华盛顿郊区，1944年8到10月间，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此举行筹建联合国的国际会议——笔者注）的政治家们所计划的那种组织。（三）倘若这个堡垒是必要的，就需要集中的经济实力，以便能把我们的能力贡献给这项创造性工作。”这是萧乾的美好梦想，无论是动物的本能，抑或强权政治永恒的历史真理，都会认为这个建议不现实。可不难看出，萧乾不正是个梦想家吗？

不久，萧乾终于取得了战地记者的资格。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军装，美式的，土绿色，头戴软帽，肩章上用金丝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字样。证件的背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按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待遇。

这里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他们是余堤元、李树清、丁垂达、徐兆墉、任玲逊等。

萧乾是乘坐一条只能容纳25人的空军营救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当时，海峡中漂着不少水雷，还经常有纳粹潜艇出没。这让他感到一种恐惧，但恐惧中又洋溢着兴奋。他紧倚着一颗对付潜艇的深水炸弹，冒着凛冽刺骨的海风，抵达法国东海岸的迪埃普港。

萧乾的特写《进军莱茵》，记述的就是他由伦敦出发，追赶美国第七军，最后到达莱茵河的神奇经历。此篇分两节，第一节《伦敦到巴黎》描述萧乾渡过英吉利海峡以后到巴黎的见闻、感受。他称赞戴高乐将军深明“有内讧就没有法兰西”的道理，对全法国反对他的人，不剿；对巴黎一半以上攻讦他的报纸，不禁。他不能离开法兰西称雄。此处当然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蒋政治独裁，扼杀舆论。军事上与共产党逐鹿争雄。第二节《往莱茵河

去》主要写萧乾在颇富浪漫性的行进中感受历史的深刻讽刺。他以白描的手笔，描绘战争给战争发动国带来的狼藉景象。德国人家挂的白旗全是用枕头或被单做的，一方面活脱脱勾勒出德军仓皇溃败的景状，一方面鲜明反映了欧战局势的迅速发展。

萧乾的高妙在于，他善于用美丽的大自然背景去陪衬一幅幅凄凉的素描：莱茵区一带是一望无际的朱红色起伏丘陵，公路宽敞平坦，密绿的松林蓊蓊郁郁，但浮动在这背景上的是戴了白色投降符的难民，一车车狼狈的战俘。整座城镇只剩下几片断壁残垣，被击毁的坦克车下，堆满了牲畜和人的尸体。盘根错节的大树也被炸成残枝断臂，宛如古希腊的石雕。德国难民就在树林里露宿。而那些被纳粹囚禁过的人们，现在挺起了腰板，他们用粉笔骄傲地在背上写下各自的国籍。各种人的精神状态给萧乾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萧乾在任随军记者和二战刚刚结束那段时间，向重庆《大公报》发回了几十篇颇具特色的特写、通讯，是中国了解欧战局势和国际形势演变的主要来源之一。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写有《虎穴的冲击》、《祝旧金山会议》、《向旧金山会议提醒几点》、《（旧金山大会）大会开幕盛况》、《论英国选战》、《由外面看》、《英美惩德论》、《波兰问题》、《积极的伤兵政策》、《英国大选及其政党前途》、《美国关切我团结反攻，对日作战在加紧进行》、《英国总选期近，竞选激烈有如比剑》、《保守党仍有胜利可能》、《柏林一片废墟》、《德境侨胞亟待救济》、《日本请降中的英伦》、《英国与东方》、《伦敦中英人士盛会》、《抗战八年贡献宏伟》、《德国之政治前途》、《复兴途中的法国》、《从占领德国看日本问题》、《美英人士盼我团结》、《从外长会议看欧洲外交》，等等。其中有近三分之二都是我在编《萧乾文集》时查到的，这些萧乾还从未收过集。

1945年3月底的一天，当萧乾随美国第七军装满黄色炸药的车队，准备参加大桥争夺战，跨过莱茵河去东岸采访的时候，突然接